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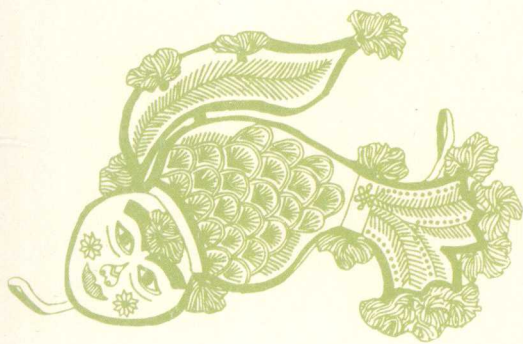
凝望

shan 山

之脊

ningwangshanzhiji

● 刘学洙 ● 著





凝望 shan 山之脊

ningwangshanzhiji

●刘学洙●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望山之脊/刘学洙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80650-913-5

I. 凝… II. 刘… III. 历史人物—生平事迹—贵州省
IV. K820.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2154 号

凝望山之脊

刘学洙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

(电话 8654672 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字数 11.375 印张 255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0-913-5/K·25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新添大道测绘院 电话:6300007 邮编:550018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录 目

CONTENTS

- 1 大臣言新政第一人
- 9 冷眼向洋黎庶昌
- 12 抗慈禧、爱贵州的林绍年
- 19 学政使黔趣事
- 24 台湾学者笔下的严修
- 27 贵州乡试开科曲折记
- 30 水西人的政治智慧
- 33 民心不可逐
- 37 孔尚任论黔文化
- 42 一百年前兴黔梦
- 47 久闭山门初打开
- 52 潮起潮落话青溪
- 56 胎死腹中的《贵渝铁路折》
- 59 清末贵州议会趣闻
- 63 顺元城话今昔
- 72 风雷动黔疆
- 79 赤水无名墓
- 82 “高家花园”春秋
- 106 吴鼎昌与《花溪闲笔》
- 118 “华家银子”沧桑

目 录

- 126 华问渠轶事
- 131 铁骨铮铮一翰林
- 141 千里乌江百块碑
- 150 “阳关道”与“独木桥”
- 163 难忘的随行采访
- 178 池必卿与“包干到户”
- 196 乌蒙汉子出山
- 226 汪小川遗札与诗词集外集
附录:汪小川谈史信札两封
- 237 人物风流两贵阳
- 245 锦江公仆情
- 253 花溪笔会忆当年
- 260 婆婆开明,媳妇好当
- 264 难忘的往事
- 268 风皱春水
——新闻改革往事杂录
- 279 报坛旧案
附录:关于报史的一封信(侯存明)
- 292 静寂的神圣
- 298 大笔激扬黔文化
- 303 黔中人才整体大观
- 306 含生机于无穷
- 311 人性与良知的呼唤

目 录

CONTENTS

318 花溪水的性格

321 一卷白描“浮世绘”

324 《沙滩文化志》书后

328 闽魂归贵山

349 百年文脉千里缘

附录:胡晓明教授书简

356 后记

大臣言新政第一人

李端棻(1833~1907),贵阳人,晚清戊戌变法关键时刻,出任礼部尚书。变法失败,18天下台,贬往新疆。晚年赦回原籍,矢志不移,继续鼓吹民主,兴办新学,致力维护贵州矿产开发权等事。他是近代中国从旧体制内部站出来挑战旧体制的改革先驱;是从边远封闭贵州走向全国,积极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第一个黔人。康有为称他“抗疏维新冠九卿”,梁启超称他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个评价是很权威,很到位的。

今年是李端棻逝世一百周年。贵州省文史界将举办纪念活动,并召开李端棻学术研讨会,彰显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更响亮地打出李端棻这张名片,宣传贵州,激励黔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历史的天平有时并不总是公平的。

对于李端棻这个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众多的中国

近代史重要著作几乎都忽略未入视线,这是令人遗憾的。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列举了参与和支持维新运动的各派代表人物达数十人,惟独对李端棻不着一笔;

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逐日罗列百日维新时期一系列变法举措和组织措施,独独未提及李端棻取代守旧派大臣,出任礼部尚书这一重要人事变动大事;

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用大量篇幅记述维新变法,也基本上见不到李端棻的身影……

究竟如何给李端棻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戊戌变法运动全局中定位?贵州史学界应当通过对李端棻的再研究、再认识,填补中国晚清维新运动史研究的这一个空白。

今年5月间,贵州省纪念李端棻筹备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提议邀请北京大学参加纪念会,共襄盛事。理由是李端棻首倡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现在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第一馆展出内容中就有李端棻首倡京师大学堂的事迹。北大人不光记住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而且也铭记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家李端棻这个京师大学堂首倡人。倚重北京大学这张大名片,让世人更了解李端棻,这当然是好主意。但这还不足突出李端棻的主要事迹。从近代中国历史大背景和维新运动大局看,李端棻独领风骚非他人可比的惟一性,就在他是:大臣言新政第一人。这种从统治集团内部高层出现的变革家,不仅是戊戌变法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也是中外历史上一切社会变革最可宝贵的内部动力与政治资源。纪念李端棻,强调这个惟一性是有历史意义和普遍意义的。

改变旧制度的推动力,有社会从下而上的力量,也有从上而下的体制内部的觉醒者和健康力量代表。提起戊戌变法,无人不知康有为、梁启超,然而,以他们为代表的维新派都是体制外的民间社会先进分子。光绪皇帝是变法的最有力的主持者,他是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然而,以他为代表的帝党势单力薄。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后党,则是一帮满洲贵族和掌握中央及地方军政大权的高官,势力很大,举凡内政、外交、人事和军事上的重大决策,大都受后党所掣肘和左右。在这形势下,体制内十分需要有眼光有胆识有威望的大臣挺身而出,辅佐光绪皇帝推进变法大计,李端棻正是这样的典型代表。

晚清官员中支持维新运动的当然不止李端棻一人。比李端棻名气大得多的帝师翁同龢也是体制内人。他对康梁等人以及变法若干举措也给予支持;他还是光绪皇帝与社会上维新派的沟通者。但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未超越富国强兵的范畴,在政治上,主要意图是通过变法实现光绪皇帝亲政。一涉及激进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翁同龢就未能超越其阶级局限性。即令如此,翁同龢也为慈禧所不容。戊戌四月,“降严旨声状其罪,即日还田里”。原因是翁同龢向光绪帝告发,将二名守旧派大臣调出军机处,引发慈禧不满。翁同龢既黜,光绪帝如断其臂,身边缺少辅佐新政的元老级重臣。于是,老臣中惟一极言新政者李端棻便被光绪看中。戊戌七月十七日(1898年9月30日),破格将李端棻擢升为礼部尚书。同时尽削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大臣之职。

这就是戊戌变法中著名的斥退“二尚书四侍郎”案。礼部位居六部之首。按惯例礼部尚书要由侍郎迁都御史再升工部、刑部、兵部尚书,才能转调任礼部尚书。可见,光绪擢升刑部侍郎李端棻一步到位,是非常之举。

三

“言新政”,其内涵与政治目标也是各有不同的。在晚清维新运动中,旧体制内不同程度、不同动机、不同阶段卷入支持维新变法的中枢大臣、封疆大吏不乏其人。但他们的思想体系及政治主张与近代民主政治和维新思潮则相距甚远。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不准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政。

李端棻的情况则有很大区别。

李端棻支持维新变法,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不算多。他上的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请推广学校折》,一个是《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前一个折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公元1896年6月12日)上的,时在戊戌前两年。那时李端棻还只是二品大臣,职位是刑部左侍郎。推广学校改革教育,本来不属于他刑部分内的事。第二个折是百日维新中期上奏的,是专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言新政”不在言多,要在其含金量。李端棻这两个折子,前者过去多有评介,但仅仅局限于教育改革范畴,未注意其中的政治改革思想。后一个折子,过去研究和宣传得不够。对李端棻再研究、再认识,这两个奏折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请推广学校折》一开头便尖锐地提问,为什么皇上号召选拔人才,“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又为什么二十多年来办了些什么同文馆,资学馆等,而效果不大?他的

回答是,那些洋务运动中所搞的教育设施,没有涉及“治国之道,富强之原”。过去的译书,“详于技艺而略于政事”,对“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讲得很少。李端棻所说的“道”、“原”、“本”,实质是政治改革问题。

过去我们宣传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往往只着眼于他提出的“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学皆设学堂”等教育改革方面,其实只要深入研读《请推广学校折》的全文,就可以发现,李端棻这折子决不局限于办学。它的要害不仅触及封建王朝的用人制度和人才培养选拔方式,而且还包含了一系列思想开放、引进新潮、舆论公开、信息共享、政治开明等思想光芒或萌芽。他提出“广立报馆”,通过现代传媒手段,使上面“无壅蔽”,下面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这就把办报与政治透明度联系起来。这个观点在一百多年前出自一个封建官僚之口,令人惊羡!他主张翻译西方书报,把西方思想与潮流,通过书报“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反对官方垄断外部世界信息,“译之甚少,又未经印刷,外间未由得见”。他是反对愚民文化政策的。即令是在器物层面的引进科学技术,他也主张跟上科技发展的前沿成果,不能光引进一些陈旧的“卒于十年前之书”。这些思想精华,在他那《请推广学校折》中写得明明白白,李端棻的思想是多么开放,岂止限于教育改革范畴。

李端棻另一奏折《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其内容为:请御门誓众,以定国是;开懋勤殿,选通人入直,议定新法;请改定六部则例;请派各省通才办各省学堂。其中除第四项外,都是政治性的改革。后来,光绪帝果真亮相天安门,“御门誓众”,昭告天下实行变法。这个折子未见全文,是《李端棻传》作者秋阳从梁启超《戊戌变法纪事本末》中转引的。梁文云:“李端棻力主是议,

梁启超与之极言，乃上言。”看出此折是李端棻与梁启超商议形成的。梁启超是李端棻早在广东乡试任主考时发现的人才，并以堂妹嫁梁。此折更说明在变法重大问题上，李端棻与维新派激进代表紧密配合。

一个重要人物之政治立场与政治观点如何，在用什么样的人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也最容易招来物议。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军机几位新人，是他的重大政治行动，也是他在戊戌变法中精彩的一着。变法失败，他被革职发往新疆，罪名也正是“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当时各派要人也曾向皇帝荐人。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中非常活跃，也把他人推荐到光绪皇帝身边。李所推荐的人，事后证明均维新坚定分子，其中，唐才常政变后流亡日本，次冬回国，1900年联络长江流域数省组织自立军，事败为张之洞杀于汉口。李荐的贵州学政严修，政变后居天津，讲新学，是日后南开大学的奠基人。从李端棻的选人用人路线，可见他的政治倾向。

四

李端棻在变法失败后的气节与坚持改革方向，尤其是体制内支持变法人物所罕有。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志士除了在政变后被杀以外，有的流亡国外，有的退隐消沉。当了京尹大官的贵州人陈夔龙在他的《梦蕉亭杂记》一书中曾经描写了一个也曾支持维新变法的朝廷大臣张荫桓被遣戍新疆见到陈夔龙时的窘态：“满面流泪，并云：我非康梁一党，不知何故得以重谴。”李端棻同样发往新疆，事前还暗地为梁启超资助经费，让他流亡日本。“迨逃至日本，（梁）任公带有李端棻所赠赤金二

百两,立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转引秋阳《李端棻传》)在甘州因病留寓时写的诗有句云:“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遥悼菜市口蒙难的烈士。唐才常被杀于汉口后,李端棻闻讯写下《党祸》一诗:“几见清流误国家,权奸颠倒是非差。狭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识正邪。戮辱逋囚无漏网,晋唐明宋有前车。汉阳渡口京都市,云散风凄日又斜。”诗人把唐才常被杀于汉阳与六君子血染京都相比,表达了无比的悲愤。他还写了《闻京都学生遇害》一诗:“黑气漫漫压帝畿,嘻嘻怪事是耶非。学堂未获收明效,文字悉翻贾祸机。弥雎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何悲。党人两字真心法,一网轻投漏网稀。”为京都学生在变法失败后因继续议论时政而遭迫害表示愤慨,对朝廷“摧残国脉”表示抗议。此时的李端棻,俨然是一名激进革命志士矣。

认识李端棻,他的《苾园诗存》是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李端棻晚年的诗,除一般酬作外,主要是两大类,一是总结历史经验,一是展望光明未来,两者都展现了他的政治思想日臻进步,精神境界日臻纯高。他在贵阳公开讲学,宣传卢骚思想,孟德斯鸠三权鼎立论,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天演论等。可见,他的思想不停留在变法初期水平,而力求追根溯源,研究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作为出身科举的封建官员,这种日日新,又日新,自觉接受新思想与时俱进精神,真让百年后的吾人感慨。这些启蒙思想在他的晚年诗中都有反映。如他在《政治思想》一诗中云:“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君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始宣流。同胞若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认识李端棻,不能不读其诗。李端棻晚年咏菊诗有句云:“傲骨棱棱谁得见,骨随时世斗新妆。”这是他的自况。他棱

棱傲骨诚可贵,而他能够跟随时代潮流“斗新妆”尤可珍!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1907年1月15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当时梁启超还流亡日本。李家后人驰书日本,请这个不同政见的朝廷要“犯”公然为李端棻作墓志铭,这也表示了清王朝气数已尽,人心向背。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写到:“盖其为民请命之心,历数十载如一日也。距梦奠前数日,犹寓书启超曰: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将犹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李端棻童心依旧,垂暮志如青春年少。

李端棻只当了十八天的礼部尚书,但他的精神力量岂能以当官时间的长短所可计算的么?!



京师大学堂—校牌

冷眼向洋黎庶昌

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湖南岳麓书社钟叔河主编了一部《走向世界丛书》,其中首批推出的有黎庶昌《西洋杂志》,盛赞它是“一卷西洋风俗画”。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晚清以郑珍、莫友芝、黎氏三家形成的“沙滩文化”的代表人之一,以散文著称。然而,他的事功主要在外交方面。1877~1881年,他随郭嵩焘出使欧洲,历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使馆参赞。1881~1884年,出任驻日公使,1887~1891年再次出使日本。他是百多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打开眼界看世界的明白人。他对西方认识的深度与广度,超过林则徐;更超越洋务派,甚至试图触动“中体西用”框框。堪称是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

黎氏一生及其《西洋杂志》,最大的闪光点,还在于他翔实介绍西方“风俗画”之间的画外音,透露出在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背后,存在着制度层面的根本性支撑。

《西洋杂志》直接写政治活动不多,但每有所涉笔,都带典型意义与启迪性。他在英、法、西班牙应邀旁听

议会开会,看到西方政治运行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中国根本不同。作为关心本国命运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触发深思。他在《与李勉林观察书》中说,在伦敦“默察该国君臣之间,礼貌未尝不尊,分际未尝不严。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议会),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故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在《答曾侯书》中,更直接指陈中国专制政治的弊端,说到“中国君主专制之国,有事则主上独任其忧,臣下不与其祸。”他目睹西班牙更换宰相和法国总统下台的情况,写道:“西洋朋党最甚。……而于国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总统决意辞职,“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看出西方重大人事更迭按民主程序进行,社会少受震荡。他说瑞士不设总统,推七人决策,“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流露了他对民主政治的向往。百年前一个传统士大夫能够出此见识,不能不令人惊叹。

经历了西洋东洋十多年生活体验,黎庶昌对国事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变化。只要拿他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敬陈管见折》与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上皇帝书》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二十年间他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他的上皇帝书,仅局限于在旧体制的兴利除害的建议,而《敬陈管见折》的核心内容则是“整顿内政”、“酌用西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他奏折中提出的诸多应兴应革的大政建议之中,都贯穿着他对西方理念与制度的了解,对本国弊政的深切反思,实是黎氏十多年深思熟虑提出纲领性的变法思路。用今天的话说,它的外交内政改革,都注重与国际通则接轨。比如他参照西方“视公使甚尊”,国家重大活动,“无役不有公使揖让其间,或立谈,或授坐”,“交谊重轻,词色抑扬”,都事涉